

DOI: 10.19361/j.er.2021.01.08

劳动保护与税收规避： 来自 2008 年《劳动合同法》实施的证据

文 强*

摘要：本文探讨劳动保护对企业税收规避的影响。基于《劳动合同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与省级 4 位代码工业行业 2003—2011 年数据，利用双重差分实证发现，政策实施显著降低了劳动密集程度更高行业的实际税率，鉴于承担低实际税率的企业更有可能进行税收规避，由此说明劳动保护可能增加税收规避。控制金融危机、企业所得税改革与增值税改革试点的影响后，实证结论稳健。进一步分析发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实际税率下降，并非政府放松税收征管，抑或是企业增加税收抵扣。最后，政策实施显著影响到企业规模、盈利能力等特征，而上述因素会影响实际税率，这揭示了劳动保护影响税收规避的可能路径。本文研究认为，要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需要将“卢卡斯批判”思想纳入考量。

关键词：税收规避；《劳动合同法》；税收征管；税收抵扣

一、引言

税收对国家经济生活和社会文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纳税是经济主体的基本义务。然而，税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成本，纳税主体有动机进行“税收规避”^①（Allingham and Sandmo, 1972）。现实生活中税收规避行为非常普遍：对美国的调查发现，2016 年末报税收入总额高达 2 146 亿美元，每 4 位居民中就有 1 位没有报告兼职收入（McDermott, 2017）；中国也存在税收规避行为，例如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序有关工作的通知》（税总发〔2018〕153 号）就指出，近年来我国影视行业整体呈现出良好态势，但也存在偷逃税款等问题。税收规避行为尽管给国家带来巨大损失，却难以被准确甄别和测度（Cai and Liu, 2009），而且承担实际税率更低的企业进行税收规避的可能性更大（范子英、田彬彬，2016）^②。由此可见，当实际税率出现明显下降时，税收规避行为增加可能是重要解释。

我们注意到：第一，自 2008 年起中国企业的实际税率出现明显下降。如图 1（a）所示，相较于 2007 年及以前，2008 年以后的实际税率明显下降 2 个百分点左右；第二，不同行业实

* 文强，四川大学商学院，邮政编码：610064，电子信箱：durianwen@scu.edu.cn。

作者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与修改建议，文责自负。

① 文献中也使用“避税”或者“逃税”，二者的区别在于“合法性”。由于合法性的模糊特征，借鉴已有研究统称为“税收规避”。

② 税收规避可能性的增加，既可能是现有企业税收规避程度的加大，也有可能是更多的企业开始进行税收规避。现有研究并未加以区分，已有数据也难以进行识别，本文亦将不加区分。

际税率的下降幅度存在异质性。根据各行业 2007 年的劳动密集程度,将劳动密集程度大于中位数的行业定义为“高”劳动密集程度行业,否则定义为“低”劳动密集程度行业。图1(b)显示,自 2008 年起不同劳动密集程度行业的实际税率出现明显分化,其中高劳动密集程度行业的实际税率下降幅度更大。我们自然要问,如何理解 2008 年后高劳动密集程度行业的企业更有可能进行税收规避的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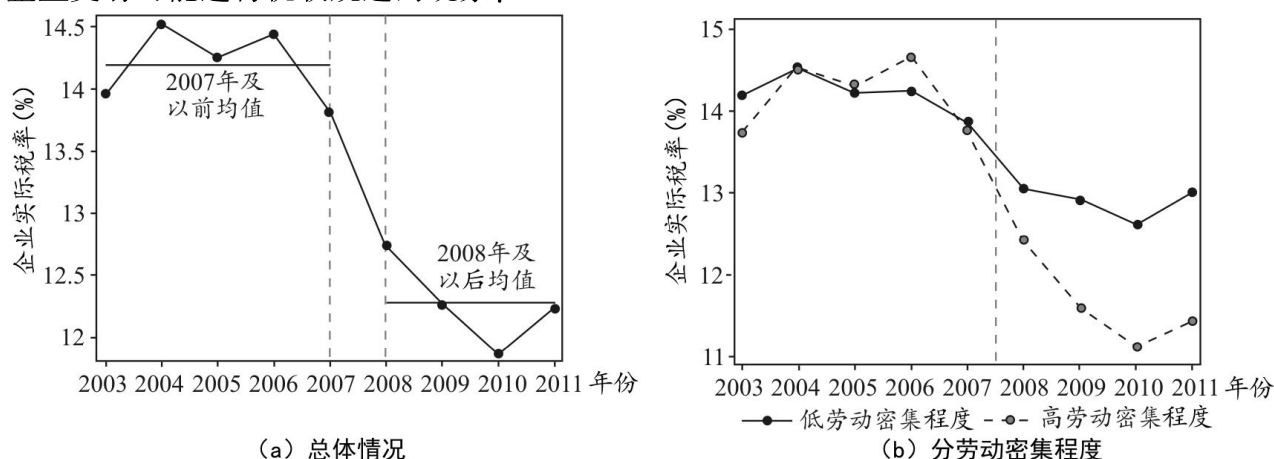


图 1 2003—2011 年企业实际税率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CSMAR 中国工业行业研究数据库计算所得。)

现有研究指出,企业税收规避行为随着其经营环境的变迁而改变(Cai and Liu, 2009),其中 2008 年实施的《劳动合同法》,明显增强了劳动保护(Cui et al., 2018),这会显著降低企业经营弹性(陈德球等, 2014; 廖冠民、陈燕, 2014),其中劳动密集程度更高行业的企业受到的影响更大(Cui et al., 2018; 倪晓然、朱玉杰, 2016)。要素市场上劳动保护的增强与不同劳动密集程度行业实际税率的异质性下降的时间节点相吻合,由此提出具体研究问题:劳动保护增强了企业的税收规避吗? 如果有影响,其机制是什么? 本文将基于《劳动合同法》政策实施前后(第一重差分)不同劳动密集程度行业(第二重差分)的实际税率差异,采用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识别政策“处理效应”,并考察劳动保护影响企业税收规避的可能机制。

本文研究可能的贡献如下:第一,丰富了探究宏观环境对税收规避影响的相关研究。现有研究从制度环境(刘慧龙、吴联生, 2014)、税收征管(陈晓光, 2016; 范子英、田彬彬, 2013)、行业环境(Cai and Liu, 2009)等角度考察了宏观环境对企业税收规避的影响,但要素市场环境变迁是否也影响到税收规避,少有相关讨论,本文则分析劳动力市场环境变化对税收规避的影响。第二,将劳动保护与税收规避行为联系起来。已有研究考察最低工资标准(Tonin, 2011)、社会保险项目(Bergolo and Cruces, 2014)对税收规避的影响,但都关注对国外居民的作用,本文则探讨劳动保护对中国企业的影响。第三,拓展了评估《劳动合同法》的社会经济影响相关研究。现有研究讨论《劳动合同法》对工人劳动合同签约、收入水平、福利水平等(Cheng et al., 2014; 杜鹏程等, 2018; 孙中伟等, 2018)的影响,也分析对企业劳动雇佣、经营策略等(Akee et al., 2019; Cui et al., 2018; 刘媛媛、刘斌, 2014)的影响,但鲜有研究涉及对纳税行为的影响,本文则进行初步尝试。

后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回顾政策背景并介绍文献假说;第三部分说明实证模型与使用的数据;第四部分报告《劳动合同法》实施对实际税率的政策处理效应;第五部分进一步

探讨劳动保护影响税收规避的可能机制;第六部分总结全文。

二、制度背景与文献假说

(一)《劳动合同法》实施及其影响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用人单位无权自行招用工人,劳动者无权自择职业,因此 1978 年以前中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关系”,劳动保护并不适用。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企业与工人之间的直接联系不断增加,市场化的个别劳动关系初步形成。作为个别劳动关系形成的法律形式,劳动合同是市场化劳动关系法律规制的首要 and 基础内容(常凯,2013)。劳动合同制度自 1980 年代试行,并在 1995 年颁布的《劳动法》中正式推行,但实施效果并不理想,政府于是重新思考立法问题。《劳动合同法》自 2005 年起进入立法程序,于 2007 年 6 月 29 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于 2008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

与《劳动法》相比,《劳动合同法》的劳动保护力度明显提升(Cui et al., 2018):第一,规定企业必须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第二,规定员工试用期的工资水平;第三,明确违反《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的惩处。从实施情况来看,《劳动合同法》增强了劳动保护:从员工角度来看,政策实施后合同签约率显著提高(孙中伟等,2018)、收入水平明显提升(Cheng et al., 2014)、其他社会福利也显著改善(杜鹏程等,2018);从企业角度来看,政策实施提高了成本粘性、降低了经营弹性(陈德球等,2014;廖冠民、陈燕,2014)。

《劳动合同法》实施显著改变了企业经营环境,企业也相应地做出反应:从要素投入来看,一方面企业开始用机器设备替代人工(刘媛媛、刘斌,2014),另一方面也直接解雇工人(Akee et al., 2019);从经营策略来看,企业会增加现金持有(Cui et al., 2018)、降低投资水平(潘红波、陈世来,2017)并加大创新投入(倪骁然、朱玉杰,2016)。企业的目标是收益最大化,既然《劳动合同法》改变其经营环境,这可能影响到它们的盈利,而税收规避又是企业最大化期望收益的重要选择(Allingham and Sandmo, 1972),那么企业是否会通过改变税收规避行为来应对劳动保护呢? 现有研究并未就此展开充分讨论。

(二)劳动保护与企业税收规避

纳税是企业经营活动的重要成本,经营主体有动机进行税收规避以实现其期望收益最大化。现有研究发现,经营环境变迁,会影响企业的税收规避行为:在产品市场环境方面,Cai 和 Liu(2009)发现,市场竞争会提高企业的税收规避程度,因为企业有动机通过避税以留存投资资源从而增强其市场竞争力;在要素市场环境方面,刘行和叶康涛(2014)发现,金融发展可以抑制企业税收规避,因为金融发展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从而降低税收规避的边际收益。

要素市场包括资本市场与劳动力市场,有研究开始关注劳动力市场环境对税收规避行为的影响,但关注对个人行为的影响。Tonin(2011)考察最低工资对税收规避的影响。他构建了包含企业与雇员决策的理论模型,刻画两类行为主体的税收规避合谋行为。模型结果显示,当引入最低工资标准以后,报税收入将在最低工资标准处突然增加。利用匈牙利 2001 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准自然实验,Tonin 基于家庭预算调查数据证实了模型的理论预测。Bergolo 和 Cruces(2014)考察社会保险项目对税收规避的影响。乌拉圭于 2008 年进行社会保险改革,医疗保险覆盖面扩展到私营部门注册工人所抚养的子女身上,利用这一准自然实验,作者发现改革导致薪酬低报的发生率显著提高 25%。

劳动力市场环境变迁尽管影响居民税收规避行为,但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税收规避并不清楚。结合企业税收规避行为的决定因素以及劳动保护对企业经营行为影响的相关研究,本文提出劳动保护影响企业税收规避的可能机制。首先,影响企业税收规避的议价能力。一方面,大企业的游说力量更强、政策参与度更深,因而实际税率更低、税收规避程度更高(Siegfried, 1972),但大企业受到更严密的监督、承担非盈利性社会目标,因而实际税率更高、税收规避程度更低(Zimmerman, 1983);另一方面,盈利能力更高的企业拥有更强的议价能力,因而实际税率更低、税收规避程度更高(Manzon and Plesko, 2002)。由此可见,当企业的规模或者盈利能力受到劳动保护的影响时,其税收规避程度可能发生变化。现有研究发现,劳动保护不仅促进企业使用机器设备替代人工(刘媛媛、刘斌, 2014),而且促进企业创新(倪晓然、朱玉杰, 2016),其中资产规模是衡量企业大小的重要指标(刘慧龙、吴联生, 2014; 刘行、叶康涛, 2014),而创新可能提高企业利润率(Geroski et al., 1993),这说明劳动保护可能影响企业的规模和盈利能力,进而影响其税收规避行为。

其次,影响企业税收规避的财务规则运用情况。一方面,资产折旧是企业税收抵扣的重要方式,固定资产占总资产比重越高的企业,其实际税率越低、税收规避程度更高(Gupta and Newberry, 1997);另一方面,利息支出可以抵扣税收,财务杠杆越高的企业实际税率越低、税收规避程度更高(Gupta and Newberry, 1997)。现有研究发现,劳动保护会促使企业使用更多机器设备代替劳动力,这会影响企业通过折旧进行税收规避的情况,并且劳动保护会降低企业的借款规模和长期借款比例(陈德球等, 2014),这会影响企业通过利息支出进行税收规避的情况,因此劳动保护可能影响企业的资本结构与财务杠杆,进而影响其税收规避行为。

综上所述,《劳动合同法》实施可能影响企业进行税收规避的议价能力,或者运用财务规则实施税收规避的情况。主要通过哪些机制发挥作用,后文将实证检验。

三、实证策略与数据

(一) 实证策略

本文考察 2008 年《劳动合同法》实施对企业税收规避的影响。由于实际税率更低的企业更有可能进行税收规避(范子英、田彬彬, 2016),那么当劳动保护影响到企业所承担的实际税率时,这说明劳动保护可能影响企业的税收规避。借鉴已有研究(Cui et al., 2018; 倪晓然、朱玉杰, 2016),本文使用连续 DID 考察《劳动合同法》实施对企业税收规避的政策处理效应,实证模型设定为:

$$ETR_{ijt} = \beta \times \text{Log}(Labor_{ijt}) \times Post_t + \delta_{ij} + \gamma_t + e_{ijt} \quad (1)$$

(1)式中: ETR_{ijt} 是第 j 个地区第 i 个行业第 t 年的实际税率; $Labor_{ijt}$ 是第 j 个地区第 i 个行业的劳动密集程度,取值越大表示劳动密集程度越高,那么该行业受《劳动合同法》实施的影响越大; $Post$ 表示《劳动合同法》是否实施的虚拟变量,实施以后(2008 年及以后)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 δ 是地区-行业固定效应,用以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各地区特定行业的宏观环境对实际税率的影响; γ 是年份固定效应,用以控制各年度国家层面宏观经济社会环境变迁对实际税率的影响; e 是影响实际税率的不可观测异质性。为了控制更多宏观环境对实际税率的影响,可将 e_{ijt} 拆解为:

$$e_{ijt} = \pi_{jt} + \omega_{it} + u_{ijt} \quad (2)$$

由于地方政府间存在“税收竞争”,它们可能采取不同的执法力度,最终会影响到企业税

收规避行为(范子英、田彬彬,2013),我们允许地方政府在不同时期采用不同的税收竞争策略,控制随时间变化的地区固定效应 π 对实际税率的影响;由于国家的产业政策影响企业的实际税率(Aghion et al.,2015),我们允许产业政策在不同年份存在差异,控制随时间变化的行业固定效应 ω 的影响^①。

实证模型(1)与倪晓然和朱玉杰(2016)以及 Cui 等(2018)的设定存在差异:上述两项研究以“企业”为观测单位,本文以“地区-行业”为观测单位,这一方面是囿于数据特征,2008 年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企业层面的数据存在争议;另一方面是因为该数据库中企业的数量不断增加,在企业层面测算劳动密集程度较为复杂,对于 2007 年进入的企业,仅有 1 年数据用于测算劳动密集程度,这会存在较大误差,而对于 2008 年后新进入的企业,甚至不能测算其政策实施前的劳动密集程度。有鉴于此,我们在地区-行业层面计算劳动密集程度。当政策变量在加总层面变动时,借鉴 Shi 和 Xu(2018)的研究,对分析数据进行加总,在对实证模型(1)进行参数估计时,使用地区-行业-年份内企业数量作为权重,并对标准误在地区-行业层面上进行聚类调整。

(二) 数据说明

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数据来源于 CSMAR 中国工业行业研究数据库。该数据库由行业概况、经济指标、产品产量、进出口数据四部分构成,提供 714 个工业小类(3 位+4 位代码行业)的全国、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分企业类型行业数据。数据全部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等权威经济部门。由于各行业面临的经济环境有所不同,例如 2004 年开始的增值税改革就有部分行业是 4 位代码行业,因此我们将数据限定在 4 位代码行业当中。另外,中国于 2001 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并从 2003 年起执行新的行业分类标准至 2011 年,为了排除“入世”以及统计口径调整的影响,将数据限定在 2003—2011 年间^②。

2. 变量构建

(1) 实际税率。现有研究一般使用增值税税率、所得税税率、主营业务税率以及综合税率衡量企业的实际税率(刘啟仁、黄建忠,2018),其中综合税负由增值税、所得税以及主营业务税金构成。本文使用的数据库并没有提供增值税与主营业务税金信息,因而仅能计算所得税税率。借鉴陈晓光(2016)的做法,使用“应纳所得税”与“实报利润”之比衡量所得税有效税率。为了降低极值对实证结论的影响,我们对实际税率在 5%分位数处进行缩尾处理。事实上,企业所得税在中国税收中占据重要位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8)》数据,2017 年全国各项税收总和为 144 369.87 亿元,其中企业所得税共计 32 117.29 亿元,占税收总额的 22%左右,是仅次于增值税的第二大税种。由此可见,考察劳动保护对企业所得税的影响,可以较好地反映对税收规避的影响。

(2) 劳动密集程度。借鉴 Cui 等(2018)的做法,使用单位资产雇员数量(雇员人数/总资产)衡量劳动密集程度。为了降低测量误差对实证结论的干扰,本文使用《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各地区-行业在所有年份的劳动密集程度均值作为衡量指标。

^①地区固定效应不仅包括税收竞争策略,也包含其他地区宏观环境,例如制度环境、转移支付等。同理,行业固定效应并非特指产业政策,也包括其他行业层面的宏观特征。

^②数据库中 2012 年以后的数据也存在大量缺失值。

3. 描述性统计

表 1 呈现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信息。在样本中, 共计有 68 947 个省份-行业-年份层面的观测值, 进行缩尾处理后的实际税率均值为 13.33%, 略微高于吕冰洋和张凯强(2018) 计算得到的 12.2%。另外, 各行业间的实际税率也存在较大差异, 其中 5% 分位数处的实际税率为 -6% 左右, 而 95% 分位数处的实际税率为 39.38%。图 1(a) 呈现实际税率的变动趋势。

表 1 描述性统计表

变量	(1) 观测值	(2) 均值	(3) 5 分位	(4) 50 分位	(5) 95 分位
实际税率(ETR): 原始数据	68 947	10.17	-6.153	12.39	39.56
实际税率(ETR): 5% 缩尾	68 947	13.33	-6.002	12.39	39.38
劳动密集程度(Labor): 原始数据	9 004	0.006	0.003	0.005	0.007

注: 作者根据原始数据整理所得。

在样本中, 共计有 9 004 个地区-行业的劳动密集程度观测值, 均值为 0.006, 即每百万元资产对应的员工人数为 6 人左右, 是 Cui 等(2018) 使用上市公司计算得到的劳动密集程度的 4.4 倍左右, 这可能是因为上市公司更多地依赖于资本运作。

四、劳动保护与税收规避

(一) 基本分析

为了利用双重差分法实证设计考察《劳动合同法》实施对实际税率的影响, 我们首先将所有地区-行业按照劳动密集程度中位数, 分为高、低两个组, 并考察两组的平均实际税率的变动趋势。如图 1(b) 所示, 在 2007 年及以前, 两组的平均税率基本上没有差异, 但是自 2008 年起差异呈现明显扩大趋势, 这一方面说明两组在政策实施以前具有“相似性”, 满足 DID 分析所要求的“平行趋势”假定, 另一方面说明《劳动合同法》实施具有政策处理效应, 劳动保护可能降低企业实际税率、提高企业税收规避。

表 2 报告利用实证模型(1) 进行分析的结果。第(1) 列控制省份-行业固定效应以及年份固定效应, 我们发现《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后, 省份-行业的劳动密集程度每上升 1%, 实际税率将下降 0.859 个百分点, 相当于在平均水平上使得实际税率下降 6.4%, 该影响在 1% 的统计水平上具有显著性。上述结果使用 5% 分位数处缩尾处理后的数据进行参数估计, 可能受到缩尾程度的影响。第(2) —(5) 列分别使用在 1% ~ 4% 分位数处缩尾处理后的数据进行分析, 发现劳动保护仍然会显著降低企业实际税率, 影响程度基本上在 0.85 左右, 这说明本文的数据处理方式基本上不会影响到对政策处理效应的估计。

表 2 劳动保护与企业实际税率

变量	因变量: ETR				
	(1)	(2)	(3)	(4)	(5)
	5% 缩尾	1% 缩尾	2% 缩尾	3% 缩尾	4% 缩尾
$\text{Log}(Labor) \times \text{Post}$	-0.859 *** (0.193)	-0.836 *** (0.272)	-0.849 *** (0.229)	-0.870 *** (0.211)	-0.868 *** (0.201)
观测值	68 585	68 585	68 585	68 585	68 585
R^2	0.402	0.234	0.305	0.350	0.380

注: 括号中报告在省份-行业层面进行聚类调整的稳健标准误。所有回归均控制省份-行业固定效应以及年份固定效应。*** 表示 $p < 0.01$, **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1$ 。

地区宏观环境或者行业宏观环境可能影响实际税率,忽略这些因素可能造成遗漏变量偏误。表 3 控制更多地区、行业因素的影响,实证结论稳健。第(1)(2)列分别控制省份-年份、行业-年份固定效应的影响,第(3)列同时控制所有固定效应的影响,我们发现《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后,劳动密集程度上升 1%,实际税率将显著下降 1.265 个百分点,相当于在平均水平上使得实际税率显著下降 9.5%。由此可见,劳动保护可能增加企业税收规避。

表 3 劳动保护与企业实际税率(控制其他经济环境影响)

变量	因变量:ETR(5%缩尾)		
	(1)	(2)	(3)
$\text{Log}(\text{Labor}) \times \text{Post}$	-0.505 *** (0.191)	-1.737 *** (0.285)	-1.265 *** (0.292)
观测值	68 585	68 516	68 516
R^2	0.434	0.462	0.491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Yes	No	Yes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No	Yes	Yes

注:括号中报告在省份-行业层面进行聚类调整的稳健标准误。所有回归均控制省份-行业固定效应以及年份固定效应。***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1$ 。

(二) DID 实证设计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

DID 分析的重要假定是“平行趋势”,即不存在政策冲击时,参照组与处理组的变动趋势一致。图 1(b)呈现相关数据事实,在此进一步实证验证。具体地,实证模型设定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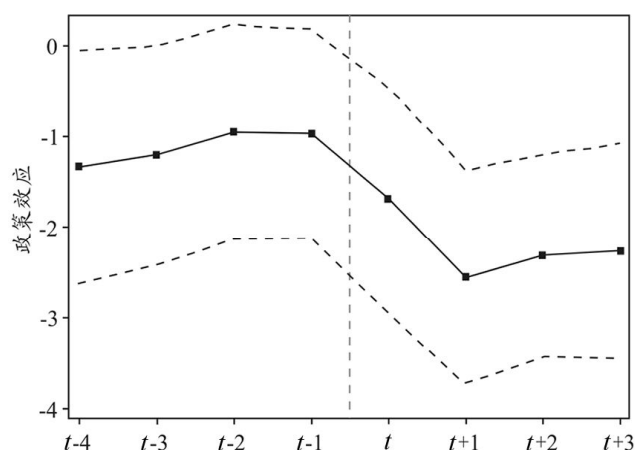
$$ETR_{ijt} = \sum_{k=-4}^3 \beta_k \times \text{Log}(\text{Labor}_{ij}) \times D_k + \delta_{ij} + \gamma_t + e_{ijt} \quad (3)$$

(3)式中: D 是虚拟变量, D_k 表示政策实施年份 2008 年到第 $t \in [2004, 2011]$ 年的距离等于 k 时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其中 $k = t - 2008$ 。例如,政策实施年份到 2007 年距离为 -1,那么 $D_{-1} = 1$;而政策实施年份到 2009 年距离为 1,则 $D_1 = 1$ 。当“平行趋势”假定满足时,政策实施之前的 β_k 不具有显著影响。实证模型(3)中其他符号的定义与实证模型(1)相同。

图 2 呈现实证模型(3)中各 β_k 的估计值及对应的 95%置信区间。据图 2 可知,政策实施前,劳动密集程度对实际税率的影响在 5%水平上不显著;而从政策实施当年起,劳动密集程度具有显著影响。对政策实施前 β_k 进行联合显著性检验, P 值为 0.282,表示在 10%水平上不能拒绝“所有 β_k 均等于 0”的原假设。相反,对从政策实施当年起至 2011 年 β_k 进行联合显著性检验, P 值为 0.000。由此可见,本文 DID 分析满足“平行趋势”假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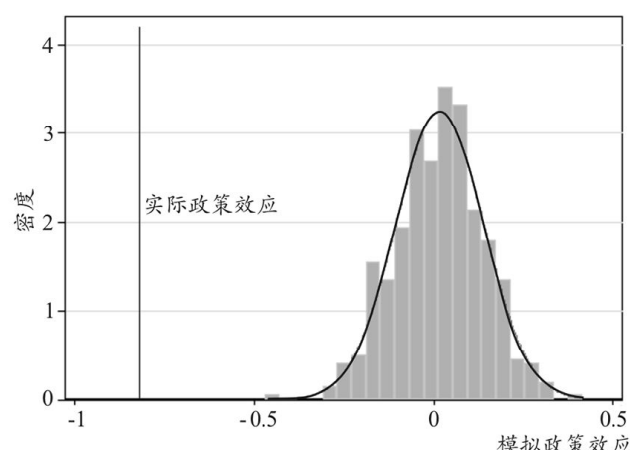
2. 安慰剂(Placebo)实验

本文识别政策处理效应依赖于“政策实施”以及“劳动密集程度”两个维度上的差异。如果《劳动合同法》实施不是实际税率下降的根本原因,那么开展“安慰剂”实验,即随机设定政策实施时间,或者随机分配各行业劳动密集程度,也可能观测到政策效果。检验“平行趋势”假定相当于随机设定政策实施时间,我们也随机分配劳动密集程度进行检验。根据测算的实际劳动密集程度,将其随机分配给样本中的各省份-行业,得到“虚拟”劳动密集程度,然后利用该数据重新估计政策处理效应,并重复 500 次。图 3 呈现“虚拟”政策处理效应的分布,显示其服从均值为 0 的正态分布,也不存在与前文估计的实际政策处理效应相似的结果。由此可见,《劳动合同法》实施可能是实际税率下降的重要原因。



注:实线是 $\text{Log}(\text{Labor}) \times D$ 的估计系数,虚线是 95% 置信区间, t 为政策年

图2 平行趋势检验



注:柱状图是 500 次随机模拟的政策效应分布情况。

图3 安慰剂实验

(三) 其他经济环境的影响

1. 新行业进入

中国的产业政策十分普遍,对于特定新兴行业的支持,可能降低实际税率(Aghion et al., 2015),这说明行业变迁可能影响实际税率。为了排除新行业进入对实证结论的影响,我们将样本限定为所有年份中省份-行业均存在的观测单位。表4第(2)列报告平衡面板数据分析结果,《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后,劳动密集程度每上升1%,实际税率将显著下降1.324个百分点,与前文结论一致。由此可见,新行业进入对本文实证结论影响较小。

2. 金融危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与《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时间基本一致,那么是金融危机而非劳动保护导致实际税率下降吗?我们认为上述假说并不成立:首先,劳动密集型行业具有更强的抗经济波动风险优势。裴长洪等(2011)发现,2009年中国总体出口金额下降了16%,但是鞋、家具、纺织服装、箱包、玩具、塑料制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金额下降幅度均大幅低于总体水平,这说明劳动密集程度更高的行业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更小,金融危机可能不会影响到高劳动密集程度行业的税收规避行为。

其次,企业税收规避呈现“逆周期”特征。陈冬等(2016)发现,企业税收规避行为与经济周期相关,当经济下行时,企业的实际税率更高、税收规避行为更少,这说明即使金融危机会影响到实际税率,也可能是提高而非降低实际税率。金融危机的存在,可能使得我们低估劳动保护对实际税率的政策处理效应。

再次,本文实证检验说明金融危机将提高实际税率。金融危机对出口的影响最大,那么2008年以前出口更多的行业,2008年及以后实际税率的变动幅度可能更大。基于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样本,使用出口交货值与工业总产值计算地区-行业层面的出口比重($Export$),并将该数据与政策虚拟变量($Post$)的交互项加入实证模型(1)中。表4第(3)(4)列显示,2008年以前出口比重更高的地区-行业,在金融危机以后实际税率都显著上升。另外,在控制金融危机的影响之后,劳动保护对实际税率的影响更大,这说明金融危机导致的实际税率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劳动保护对实际税率的显著负向影响。由此可见,2008年后企业实际税率的显著降低,并非是金融危机的作用。

表 4 劳动保护与企业实际税率(控制其他政策环境影响)

变量	因变量:ETR						因变量:销售 ETR		因变量:ETR	
	行业变迁影响		金融危机影响		所得税改革影响		所得税改革影响		增值税改革试点影响	
	(1)	(2)	(3)	(4)	(5)	(6)	(7)	(8)	(9)	(10)
	所有数据	平衡面板	所有数据	平衡面板	所有数据	平衡面板	所有数据	平衡面板	所有数据	平衡面板
$\text{Log}(\text{Labor}) \times \text{Post}$	-1.265*** (0.292)	-1.324*** (0.322)	-1.383*** (0.293)	-1.458*** (0.323)	-1.141*** (0.289)	-1.206*** (0.318)	-0.071*** (0.015)	-0.071*** (0.016)	-1.151*** (0.289)	-1.218*** (0.318)
$\text{Log}(1+\text{Export}) \times \text{Post}$			5.410*** (1.047)	5.908*** (1.145)	2.534** (1.050)	2.968*** (1.144)	0.134** (0.055)	0.133** (0.060)	2.538** (1.049)	2.974*** (1.143)
$\text{Log}(1+\text{Foreign}) \times \text{Post}$					6.656*** (0.871)	6.824*** (0.947)	0.111*** (0.036)	0.111*** (0.039)	6.676*** (0.870)	6.845*** (0.946)
$\text{Pilot} \times \text{Post}$									1.081** (0.542)	1.079* (0.565)
观测值	68 516	51 404	68 516	51 404	68 516	51 404	68 524	51 408	68 516	51 404
R^2	0.491	0.504	0.492	0.505	0.493	0.507	0.785	0.799	0.493	0.507

注:括号中报告在省份-行业层面进行聚类调整的稳健标准误。所有因变量在 5%分位数处进行缩尾处理。所有回归均控制省份-行业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省份-年份固定效应、行业-年份固定效应。稳健性检验在前一项基础上进行。***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1$ 。

3. 所得税改革

前文关注《劳动合同法》实施对实际税率的影响,其中实际税率使用所得税税率衡量。事实上,2008 年政府对所得税法定税率进行了调整,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是取消外资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实行统一税率,大部分企业的法定税率从过去的 33%降低到 25%,而原享受 15%和 24%优惠税率的企业提高到 25%(蔡蕾等,2017)。由于到 2012 年外资的占比不超过 12%(裴长洪,2014),从加权平均来看,所得税改革整体上将降低平均法定税率。那么观察到的 2008 年实际税率下降,能否由所得税改革而非劳动保护来解释呢?我们认为,劳动保护仍然具有解释能力:首先,所得税改革并不一定降低实际税率。Fisman 和 Wei(2004)发现,面临法定税率越高的企业越有可能进行税收规避,这说明所得税法定税率下降,可能减少税收规避行为,从而提高实际税率。蔡蕾等(2017)基于上市公司数据,发现所得税改革后,法定税率上升的公司其避税程度显著提高,而法定税率下降的公司其避税程度显著下降。由于法定税率下降的企业的比重更高,所得税改革可能总体上降低了税收规避。法定税率的下降与税收规避程度的降低,对实际税率会产生相反作用的两股力量相互作用,最终不一定降低实际税率。

其次,在控制所得税改革的影响之后,《劳动合同法》实施仍然具有显著的政策处理效应。如前文所述,2008 年所得税改革的核心内容是统一内外资企业的法定税率,那么改革以前外资比重越高的地区-行业,越有可能受到改革的影响。基于 2007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样本,借鉴裴长洪(2014)的做法,使用中国港澳台资本金与外商资本金之和占实收资本比重衡量外资比重(Foreign),并将外资比重与政策虚拟变量(Post)的交互项加入实证模型(1)中。表 4 第(5)(6)列显示,所得税改革以前外资比重越高的地区-行业,2008 年以后的实际税率有显著提高,这说明所得税改革有可能提高而非降低实际税率。在控制所得税改革的影响之后,《劳动合同法》实施仍然具有显著的政策效应,并且该效应仅有轻微下降。由此可见,所得税改革并未改变本文的研究结论。

再次,受所得税改革影响较小的其他实际税率,仍然受到劳动保护的显著影响。所得税

改革与所得税实际税率之间的直接关系,使得我们并不能完全排除所得税改革对实证结论的干扰。作为补充分析,我们考察《劳动合同法》实施对其他税率的影响。CSMAR 中国工业行业研究数据库提供了“产品销售收入”以及“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数据,据此我们计算了销售实际税率,并在 5%分位数处进行缩尾处理。在样本中,销售实际税率均值为 0.661%,远远低于所得税实际税率。表 4 第(7)(8)列显示,《劳动合同法》实施对销售实际税率具有显著的政策处理效应,这说明所得税改革不能完全捕捉劳动保护所带来的政策处理效应。特别地,由于所得税改革对销售实际税率具有溢出效应,而中国自 2004 年起试点增值税改革,有可能是增值税试点降低了实际税率。据此,我们手工收集地区-行业层面的增值税试点情况,并在表 4 第(9)(10)列中控制该试点(*Pilot*)的影响,发现《劳动合同法》实施仍然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实际税率。由此可见,所得税改革与增值税改革试点,不能替代劳动保护对企业税收规避的显著影响。

五、机制探讨

(一) 竞争性假说的影响

前文实证研究发现,劳动保护会显著降低实际税率,这可能是因为劳动保护促进了企业税收规避。然而,企业实际税率的下降,可能是由于地方政府面对《劳动合同法》实施的外生冲击选择放松税收征管,也可能是企业支付了更多用工成本而增加了税收抵扣。在此我们尝试排除上述假说的影响。

1. 税收征管假说

地方政府间存在“税收竞争”现象,即为了争夺流动税基,政府可能降低税收征管力度,从而降低实际税率(范子英、田彬彬,2013)。现有研究发现,《劳动合同法》实施显著降低了企业经营弹性(陈德球等,2014;廖冠民、陈燕,2014),这可能影响到各地区的相对竞争力,从而地方政府可能为了争夺税基而放松税收征管,最终降低实际税率。刘林平等(2011)发现,各地区的《劳动合同法》执行力度存在差异。验证“税收征管”假说较为困难,这是因为难以测量政府的税收征管努力。然而,当地方政府面临更大的财政压力时,便会增强税收征管(陈晓光,2016),那么可以通过验证财政压力是否改变《劳动合同法》实施对实际税率的政策处理效应,从而反推政府税收征管的作用。据此,将实证模型设定为:

$$ETR_{ijt} = \beta \times \text{Log}(Labor_{ijt}) \times Post_t + \alpha \times \text{Log}(Labor_{ijt}) \times Post_t \times \text{Log}(Fiscal_j) + \delta_{ijt} + \gamma_t + e_{ijt} \quad (4a)$$

(4a)式中: $Fiscal_j$ 是第 j 个地区的财政压力指数^①。实证模型(4a)中其他变量的定义与实证模型(1)以及实证模型(2)相同,此外,本文还控制了金融危机、所得税改革以及增值税改革试点的影响。由上述实证模型可知,当 α 显著异于 0 时,说明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对《劳动合同法》实施的政策效应具有调节作用,其中 $\alpha > 0$ 表示财政压力将弱化劳动保护对实际税率的负向影响,这揭示对实际税率的影响而言,财政压力导致的税收征管力度提升与劳动保护之间是“替代”关系,政府可能通过调整税收征管力度来对冲劳动保护的影响,此时“税收征管”假说成立。换言之,验证税收征管假说,关键在于验证 α 是否显著大于 0。

^①借鉴宫汝凯(2015)的做法,使用财政支出占财政收入比重衡量财政压力,取值越大表示压力越大。为了降低测量误差的影响,使用 2003—2007 年的均值来衡量,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表 5 第(1)列呈现基于实证模型(4a)进行参数估计的结果。从表 4 可知,《劳动合同法》实施仍然显著降低实际税率,这说明劳动保护有可能增加税收规避行为,与前文的发现一致。与此同时,财政压力进一步强化了劳动保护的政策效应,这说明地方政府并没有通过放松税收征管来对冲劳动保护所带来的税收规避效应。由此可见,《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实际税率的显著下降,并非源自政府放松税收征管。

2. 税收抵扣假说

根据税收法律法规,企业纳税前可以进行税收抵扣,其中劳动雇佣相关支出属于税收抵扣范围。当劳动保护增强时,企业可能提供更高的工资或者福利(Cheng et al., 2014; 杜鹏程等, 2018; 孙中伟等, 2018),这会扩大税收抵扣规模,从而降低实际税率。验证“税收抵扣”假说并不容易,因为我们并没有税收抵扣数据。然而,劳动保护力度在地区间存在差异,其中法治水平较高地区的劳动保护力度更强(倪晓然、朱玉杰, 2016),这说明对于法治水平更高的地区而言,《劳动合同法》实施对劳动保护力度的增强相对有限,那么通过考察法治环境是否对《劳动合同法》实施的政策效应具有调节作用,可以反推税收抵扣的影响。据此,将实证模型设定为:

$$ETR_{ijt} = \beta \times \text{Log}(Labor_{ij}) \times Post_t + \alpha \times \text{Log}(Labor_{ij}) \times Post_t \times \text{Log}(Law_j) + \delta_{ij} + \gamma_t + e_{ijt} \quad (4b)$$

(4b)式中:Law_j是第j个地区的法治环境指数^①。模型(4b)中其他变量的定义与实证模型(4a)相同,本文还控制了金融危机、所得税改革以及增值税改革试点的影响。基于上述实证模型,当α显著异于0时,说明法治环境将影响到劳动保护的政策处理效应。因此,验证税收抵扣假说,关键在于验证α是否显著异于0。

表 5 第(2)列呈现基于实证模型(4b)所得到的参数估计结果。从表 5 可以看出,法治环境并未对《劳动合同法》实施的税收规避效应发挥调节作用。由此可见,实际税率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出现的显著下降,可能与企业的正常税收抵扣行为无关。

表 5 竞争性假说检验

变量	因变量:ETR(5%缩尾)	
	(1)	(2)
	税收征管假说	税收抵扣假说
Log(Labor)×Post	-1.147 *** (0.321)	-1.058 (0.980)
Log(Labor)×Post×Log(Fiscal)	-0.864 ** (0.398)	
Log(Labor)×Post×Log(Law)		-0.088 (0.531)
观测值	51 404	51 404
R ²	0.507	0.507

注:括号中报告在省份-行业层面进行聚类调整的稳健标准误。所有回归分析基于平衡面板数据展开。所有税率在 5%分位数处进行缩尾处理。所有回归均控制省份-行业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省份-年份固定效应、行业-年份固定效应,以及金融危机、所得税改革、增值税改革试点的影响。***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5$ 。

①借鉴刘慧龙和吴联生(2014)的做法,使用樊纲等(2011)编制的制度环境指数来衡量,取值越大表示法治环境越好。为了降低测量误差的影响,本文使用 2003—2007 年的均值来衡量。

(二) 可能的路径探讨

前文发现《劳动合同法》实施显著降低实际税率,本小节探讨可能的影响路径。首先,考察政策实施对企业税收规避行为的决定因素的影响,实证模型设定为:

$$X_{ijt} = \beta \times \text{Log}(Labor_{ijt}) \times Post_t + \delta_{ij} + \gamma_t + e_{ijt} \quad (5a)$$

(5a)式中: X 是企业规模($Size$)、盈利能力(ROA)、资本结构(CAP)与财务杠杆(LEV)等特征变量。 e 的结构与式(2)相同,还包括金融危机、所得税改革以及增值税改革试点的影响。根据原始数据结构,将企业特征在地区-行业-年份层面上呈现,其中企业规模是总资产对数,盈利能力是利润总额占总资产比重,资本结构由固定资产占总资产比重衡量,财务杠杆是资产负债比(刘慧龙、吴联生,2014;刘行、叶康涛,2014)。

表6A呈现《劳动合同法》实施对企业特征的影响。从表中可以看出,《劳动合同法》实施将显著扩大企业规模、提升企业盈利能力,其中前者与理论预测一致,后者可能是因为劳动保护促进企业创新所带来的收益大于其对劳动力成本的提升作用,最终提高了盈利能力。与此同时,《劳动合同法》实施对企业资本结构没有显著影响,但是会显著降低企业杠杆率,其中前者可能是因为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与折旧决策导致资本结构的分子与分母同比例变化,后者与理论预测相一致。

表 6A 劳动保护与企业特征

变量	(1)	(2)	(3)	(4)
	因变量: $Size$	因变量: ROA	因变量: CAP	因变量: LEV
$\text{Log}(Labor) \times Post$	0.208 *** (0.018)	0.010 *** (0.002)	0.010 (0.002)	-0.016 *** (0.003)
观测值	51 408	51 404	45 696	51 408
R^2	0.951	0.836	0.848	0.781

注:同表5。

其次,验证文献关注的主要因素对实际税率的影响,实证模型设定为:

$$ETR_{ijt} = \beta \times X_{ijt} + \delta_{ij} + \gamma_t + e_{ijt} \quad (5b)$$

(5b)式中: X 是企业规模、盈利能力、资本结构与财务杠杆等企业特征。其他变量的定义与实证模型(1)以及实证模型(5a)相同。表6B报告企业特征对实际税率的影响。

表 6B 企业特征与企业实际税率

变量	因变量: ETR (5%缩尾)			
	(1)	(2)	(3)	(4)
$Size$	-0.841 *** (0.195)			
ROA		-27.270 *** (1.721)		
CAP			-2.996 *** (1.030)	
LEV				0.963 (0.825)
观测值	51 404	51 404	45 692	51 404
R^2	0.507	0.512	0.512	0.506

注:同表5。

表6第(1)列显示企业规模对实际税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与Siegfried(1972)的理论

预测相一致。第(2)列显示盈利能力更强的企业的实际税率更低,与 Manzon 和 Plesko (2002)的理论预测相一致。第(3)列说明企业固定资产占比更高的企业的实际税率更低,与资产折旧税收抵扣假说(Gupta and Newberry, 1997)的预测相一致。第(4)列呈现杠杆率对企业实际税率没有显著影响,与田彬彬和范子英(2016)的实证发现相一致。

综合表 6A 与表 6B 的实证发现,并结合“中介效应”检验的思想,可知《劳动合同法》实施可能通过扩大企业规模、提升企业盈利能力的方式降低企业实际税率。由于大型企业、盈利能力更强的企业有进行税收规避的“议价能力”,那么劳动保护可能通过增强企业议价能力的方式增加其税收规避行为。

六、总结

自 2008 年起,我国企业承担的所得税实际税率出现显著下降,其中高劳动密集程度行业的实际税率下降更为明显。与此同时,旨在增强劳动保护的《劳动合同法》于 2008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其中高劳动密集程度行业受《劳动合同法》实施的影响更大。由于承担实际税率更低的企业更有可能进行税收规避,而不同劳动密集程度行业实际税率的分化与《劳动合同法》实施的时间节点重合,本文提出劳动保护可能影响企业的税收规避。

利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研究发现,《劳动合同法》实施显著降低了实际税率,在排除金融危机、所得税改革以及增值税改革试点等经济社会环境变迁的影响之后,上述实证结论具有稳健性。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的税收征管以及企业的税收抵扣并不是《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企业实际税率下降的原因,这说明增强劳动保护可能促使企业进行税收规避。进一步分析发现,劳动保护“倒逼”企业做大规模并提高盈利能力,这可能使得企业拥有更强的议价能力,从而提升税收规避程度。

本文的研究发现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第一,政府在制定各项政策时,需要将“卢卡斯批判”思想纳入考量。“卢卡斯批判”指出,传统政策分析失效的重要原因是没有充分考虑到政策变动对人们预期的影响。《劳动合同法》实施的初心是增强劳动保护,其预期目标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也不断实现,但是该政策实施却产生了预期外的负外部性,那就是企业面对政策冲击时可能进行了更多的税收规避。换言之,《劳动合同法》在制定之时,可能并未充分考虑企业可能的应对策略,最终影响到政府的税收征管工作。由此可见,制定一项良好的政策,应当充分考虑各类经济主体对政策实施的反应机制,尽可能避免政策执行效果因经济主体策略行为的变动而大打折扣。

第二,加强税收征管,尤其是对议价能力强的企业的税收征管工作,有助于保障国家的税收安全。经济主体出于收益最大化原则有动机进行税收规避,其税收规避程度取决于其对税收抵扣政策的运用以及实施税收规避的议价能力。本文发现劳动保护增加企业的税收规避行为,主要是通过影响企业税收规避议价能力的方式发挥作用,这不仅可能导致国家损失税收收入,还会影响税收征管的公平正义。因此,政府有必要加大对议价能力更强的企业的税收征管力度,降低它们的税收规避程度。

《劳动合同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尽管提供了考察劳动保护对企业税收规避行为影响的良好契机,但是,2008 年前后中国经济社会环境的剧烈变迁,使得识别《劳动合同法》对税收规避的因果影响存在挑战,而数据可得性又进一步限制了实证分析的广度与深度。在未来数据更为丰富的情况下,可以利用更加清晰的政策外生冲击,更为深入地探讨劳动保护影

响企业税收规避行为的具体机制,这对于政策制定与学术研究都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1. 蔡蕾、苏文兵、李心合,2017:《税率调整、公司避税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研究——基于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的经验证据》,《当代财经》第6期。
2. 常凯,2013:《劳动关系的集体化转型与政府劳工政策的完善》,《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3. 陈德球、胡晴、梁媛,2014:《劳动保护、经营弹性与银行借款契约》,《财经研究》第9期。
4. 陈冬、孔墨奇、王红建,2016:《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经济周期与国企避税》,《管理世界》第5期。
5. 陈晓光,2016:《财政压力、税收征管与地区不平等》,《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6. 杜鹏程、徐舒、吴明琴,2018:《劳动保护与农民工福利改善——基于新〈劳动合同法〉的视角》,《经济研究》第3期。
7. 樊纲、王小鲁、朱恒鹏,2011:《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经济科学出版社。
8. 范子英、田彬彬,2013:《税收竞争、税收执法与企业避税》,《经济研究》第9期。
9. 范子英、田彬彬,2016:《政企合谋与企业逃税:来自国税局长异地交流的证据》,《经济学(季刊)》第15卷第4期。
10. 宫汝凯,2015:《财政不平衡和房价上涨:中国的证据》,《金融研究》第4期。
11. 廖冠民、陈燕,2014:《劳动保护、劳动密集度与经营弹性:基于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实证检验》,《经济科学》第2期。
12. 刘行、叶康涛,2014:《金融发展、产权与企业税负》,《管理世界》第3期。
13. 刘慧龙、吴联生,2014:《制度环境、所有权性质与企业实际税率》,《管理世界》第4期。
14. 刘林平、雍昕、舒玢玢,2011:《劳动权益的地区差异——基于对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外来工的问卷调查》,《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15. 刘启仁、黄建忠,2018:《企业税负如何影响资源配置效率》,《世界经济》第1期。
16. 刘媛媛、刘斌,2014:《劳动保护、成本粘性与企业应对》,《经济研究》第5期。
17. 吕冰洋、张凯强,2018:《转移支付和税收努力:政府支出偏向的影响》,《世界经济》第7期。
18. 倪骁然、朱玉杰,2016:《劳动保护、劳动密集度与企业创新——来自20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的证据》,《管理世界》第7期。
19. 潘红波、陈世来,2017:《〈劳动合同法〉、企业投资与经济增长》,《经济研究》第4期。
20. 裴长洪,2014:《中国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量化估算及其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21. 裴长洪、彭磊、郑文,2011:《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经验与理论分析——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一种总结》,《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22. 孙中伟、刘明巍、贾海龙,2018:《内部劳动力市场与中国劳动关系转型——基于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和田野资料》,《中国社会科学》第7期。
23. 田彬彬、范子英,2016:《税收分成、税收努力与企业逃税——来自所得税分享改革的证据》,《管理世界》第12期。
24. Aghion, P., J. Cai, M. Dewatripont, L. Dum, A. Harrison, and P. Legros. 2015. "Industrial Policy and Competition."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7(4): 1-32.
25. Akee, R., L. Zhao, and Z. Zhao. 2019.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China's New Labor Contract Law on Unemployment and Welfare Loss of the Workers." *China Economic Review* 53: 87-105.
26. Allingham, M., and A. Sandmo. 1972. "Income Tax Evasion: A Theoret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3): 323-338.
27. Bergolo, M., and G. Cruces. 2014. "Work and Tax Evasion Incentive Effects of Social Insurance Program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17: 211-228.
28. Cai, H., and Q. Liu. 2009. "Competition and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Evidence from Chinese Industrial Firms." *Economic Journal* 119(537): 764-795.
29. Cheng, Z., R. Smyth, and F. Guo. 2014. "The Impact of China's New Labour Contract Law on Socioeconomic

- Outcomes for Migrant and Urban Workers.” *Human Relations* 68(3): 329–352.
- 30.Cui, C., K. John, J. Pang, and H. Wu. 2018. “Employment Protection and Corporate Cash Holdings: Evidence from China’s Labor Contract Law.”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92: 182–194.
- 31.Fisman, R., and S. Wei. 2004. “Tax Rates and Tax Evasion: Evidence from ‘Missing Imports’ in Chin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2(2): 471–496.
- 32.Geroski, P., S. Machin, and J. Van Reenen. 1993. “The Profitability of Innovating Firms.”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24(2): 198–211.
- 33.Gupta, S., and K. Newberry. 1997. “Determinants of the Variability in Corporate Effective Tax Rates: Evidence from Longitudinal Data.”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16(1): 1–34.
- 34.Manzon, G., and G. Plesko. 2002. “The Relation between Financial and Tax Reporting Measures of Income.” *Tax Law Review* 55(2): 175–214.
- 35.McDermott, J. 2017. “Side Hustle and Tax Evasion: The Telling Statistics.” <https://www.finder.com/side-hustle>.
- 36.Shi, X., and Z. Xu. 2018.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Firm Exports: Evidence from the Eleventh Five-Year Plan in China.”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89: 187–200.
- 37.Siegfried, J. 197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Structure and the Effect of Political Influenc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Corporation Income Tax Program.”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 38.Tonin, M. 2011. “Minimum Wage and Tax Evasion: Theory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5(11–12): 1635–1651.
- 39.Zimmerman, J. 1983. “Taxes and Firm Size.”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5: 119–149.

Labor Protection and Tax Evasion: Evidence from the Implementation of 2008 Labor Contract Law

Wen Qiang

(Business School, Sichu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 of labor protection on firms’ tax evasion. Based on the quasi-experiment of China’s Labor Contract Law, provincial 4-digital industrial data from 2003 to 2011, and DID method,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law significantly decreases the effective tax rate (ETR) of labor-intensive industries. Since firms undertaking lower ETR have greater motivation to avoid tax, the above finding indicates that labor protection may contribute to tax evasion.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robust after controlling the impacts of 2008 financial crisis, corporate income tax reform and value-added tax reform.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local governments’ fiscal pressure will significantly enlarg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labor protection, while the law environment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illustrating that the law results in neither decrease in tax collection nor increase in tax credit. Lastly, the policy can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firms’ size and profitability, which will significantly affect ETR. Therefore, these findings shed a light upon possible mechanisms of labor protection and tax evasion. In sum, this paper confirms that taking “Lucas Critique” into account is necessary for establishing reasonable and scientific policies.

Keywords: Tax Evasion, Labor Contract Law, Tax Collection, Tax Credit

JEL Classification: H26, J88

(责任编辑:陈永清)